

吴越王金涂塔形制来源新探

王敏庆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佛塔的建筑形制与敦煌壁画研究关系密切。关于五代时期金涂塔形制来源的探讨, 学者们往往关注了它与早期单层方形覆钵塔的相似性, 而忽视了它们的差异, 而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 正是金涂塔形制最终形成的关键环节。研究认为, 唐代中国原有的帐在受到外来建筑形式的影响后, 出现了帐檐呈倒梯形的重檐佛帐, 这种新式的佛帐既影响到当时的佛龕样式, 同时也影响到单层方形覆钵塔, 并最终形成了吴越王金涂塔的样式, 而上海青龙镇出土小铜塔形制与唐代的重檐佛帐最为接近, 是金涂塔这一变化过程的过渡形式。金涂塔形制的出现与唐代重檐佛帐密切相关。

关键词: 金涂塔 重檐佛帐 新型塔檐 粟特建筑

中图分类号: K879.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20) 02-0048-12

我国佛塔的建筑形制流变与敦煌壁画研究关系密切。关于五代时期吴越王所造之金涂塔的研究成果颇多, 就金涂塔的形制渊源而言, 很多学者也都注意到它与我国早期即南北朝时单层方形覆钵塔的关系, 如张驭寰、金申、闫爱宾等学者。^①从这些研究中不难看出, 吴越王金涂塔的形制其实是我国整个单层方形覆钵塔发展演变中的一环。但将二者对比, 发现还是有一定差别, 如金涂塔塔檐的变化、覆钵的萎缩等, 而这种差别产生的缘由尚未见论及, 即这种变化缺少一个中间环节。而本文的“新探”也正是希望弥补这一缺失的中间环节的尝试。

一、吴越王金涂塔的形制特征及早期渊源

吴越王钱俶 (929-988) 本名钱弘俶, 为避父讳改名钱俶, 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第五位君主, 于太平兴国三年 (978) 降宋。金涂塔是钱俶仿效阿育王造塔事迹所造

收稿日期: 2020-03-15

作者简介: 王敏庆 (1975-), 女, 山东牟平人。副研究员, 博士后, 主要从事佛教美术、艺术史论、名物研究。

^① 张驭寰《关于我国阿育王塔的形象与发展》,《现代佛学》1964年第4期,第35页。金申《吴越国王造阿育王塔》,《东南文化》2002年第4期,第49页。闫爱宾《宝篋印塔(金涂塔)及相关研究》,同济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宝篋印塔形制演变”一节,第71-84页。

之金铜小塔，用于盛放《宝篋印陀罗尼经》，故而亦称宝篋印塔。钱俶分两次集中造塔，相隔10年。第一次是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即乙卯岁（图1）；第二次是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即乙丑岁（图2）。这两次所造之塔上分别有“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和“吴越国王俶/敬造宝塔八万/四千所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的铭文。之后，钱俶还在“壬申岁”（宋太祖开宝五年，972）、“丙子岁”（开宝九年，976）分别为雷峰塔特制了两座银塔（图3），^①形制与前两次所造之塔相同。钱俶所造金涂塔的共同形制特征是：塔身方形，四面开圆拱龕，龕内雕佛本生故事。塔檐为倒梯形的斜面，上有口衔卷草的“荣耀之面”（Kirttimukha）纹饰，^②塔顶四角为高大的受花（亦称山花蕉叶），^③塔顶覆钵极为低平，塔顶上微凸的圆盘和稍稍鼓起的莲花，即是覆钵逐渐低平的痕迹，其中央立塔刹相轮。塔基为一呈“工”字形的方座，束腰四面是以柱子间隔的禅定佛。



图1 乙卯岁金涂塔 图2 乙丑岁金涂塔 图3 雷峰塔出土金涂塔之一^④

不少研究者在追踪其形制来源时均追溯到北朝时期的单层方形覆钵塔。所谓单层方形覆钵塔即单层塔身，塔身平面为方形，塔檐四角有受花，塔顶有一个明显的覆钵丘，其上再安置塔刹相轮。有学者也称其为亭式塔，为避免与中式建筑的亭式塔等相混，故以形态的客观描述称之。单层方形覆钵塔最早见于云冈，龙门继之，一些北魏的造像碑上也有此类塔的形象。北魏龙门的单层方形覆钵塔开始出现多层阶梯状层层向下收分的塔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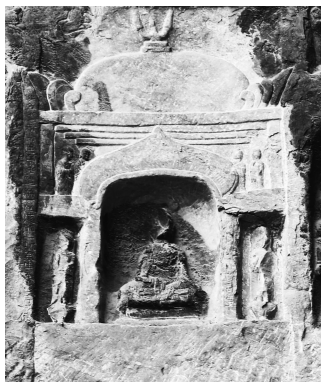
① 黎毓馨《阿育王塔实物的发现与初步整理》，《东方博物》2009年第2期，第36页。

② “荣耀之面”（Kirttimukha），又译作“天福之面”，为一种兽面形象，源出印度，南北朝时即开始在我国佛教艺术中流行，参见拙文《荣耀之面：南北朝晚期的佛教兽面图像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3卷，2013年，第499-523页。

③ 中国学界不少学者称其为受花或山花蕉叶，但查佛典并无此称，唯有蕉叶一词。一些日本学者也称佛塔上的这种构件为“请花”。还有一些日本学者称其为“方立”，但仅限于吴越王所造之塔及其与之相同的塔式，如〔日〕稻本泰生《鄞县阿育王塔の本生図と菩薩の捨身行：鑑真による模造塔将来によせて》，《戒律文化》（8），2011年，第70页。关于这一构件的名称问题比较复杂，本文权且均称之为“受花”。

④ 图1-2为作者本人拍摄，图3出自黎毓馨《雷峰塔地宫出土的纯银阿育王塔》，《东方博物》2009年第3期，第107页。

(图4-1)。北魏立体的单层方形覆钵塔,可见于甘肃庄浪发现的一座高层塔上作为塔刹的一座单层方形覆钵塔,以及四川广元皇泽寺45窟中心柱上部的半立体的小塔,所谓半立体是因小塔位于中心柱的四角,所以能呈现出塔身的两个侧面(图4-2)。皇泽寺45窟的这类小塔已出现了双覆钵顶,其来源可能是双层华盖的意象,但北朝双层覆钵塔非常罕见。北魏分裂后,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的单层方形覆钵塔继承了北魏的传统(图4-3、图4-4)。尽管有局部差异,但从整体形式上看,吴越王金涂塔与北朝单层方形覆钵塔非常相似,二者源流关系明确,塔身的尖拱楣佛龕,也是日后金涂塔塔身圆拱龕的源头。



4-1 龙门21号塔(726龕),北魏



4-2 皇泽寺45窟小塔,北魏



4-3 北周小石塔,天和六年



4-4 背屏造像上的小塔,东魏-北齐

图4 北朝时期的单层方形覆钵塔^①

入唐之后,单层方形覆钵塔有的延续前朝,如河南安阳灵泉寺唐贞观二十年(646)的优婆塞孙佰悦灰身塔(图5-1),其多层塔檐状如阶梯的形式,是延续了洛阳龙门北魏的传统,但塔檐上受花则是北齐以来的;也有的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唐垂拱三年(687)的静行比丘尼灰身塔(图5-2),双层塔檐饰连珠纹,檐角受花及正中

^① 图4-1、4-2、4-4为作者本人拍摄。图4-3引自[日]斋藤龍一编《大阪市立美術館山口謙四郎藏中国彫刻》,大阪:大阪市立美术馆发行,2013年,第93页。

装饰均是北齐以来的火焰宝珠样式，覆钵较小，还没有受花高大，覆钵上承托一仰莲基座，上承与第一层完全相同的塔檐和覆钵顶，上安相轮。其塔身略长，在塔额部分加饰了一条带状的口衔卷草的“荣耀之面”纹饰，以及下面形似垂鳞、由翠羽“图案化的羽纹”。^① 又如莫高窟初唐第 323 窟北壁佛教史迹画中的佛塔（图 5-3），其塔身下部是方形，但在接近塔檐时则变成了圆形。这种塔身下方上圆的单层方形覆钵塔到晚唐五代时，演化出更为繁复的形式，塔檐四角的受花被四个与主塔形制完全相同的小塔所取代，塔身下也不是简单的阶梯状基座，而是有着围栏和小桥般的踏步（图 5-4）。总之，唐代以来的单层方形覆钵塔，多数是在北朝单层方形覆钵塔的基础上不断花样翻新，令人眼花缭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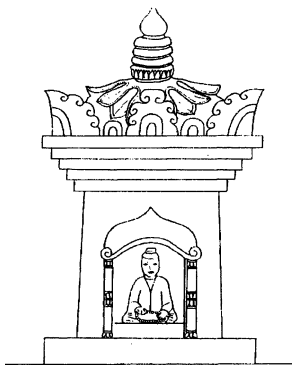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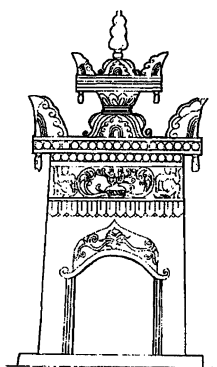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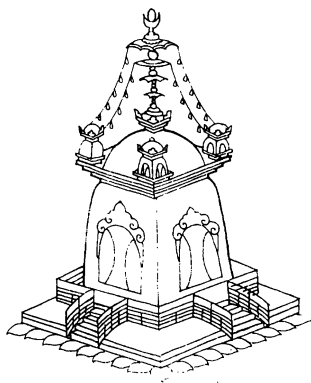
5-1 优婆塞孙佰悦灰身塔^②5-2 静行比丘尼灰身塔^③5-3 莫高第 323 窟壁画中佛塔^④5-4 莫高第 340 窟五代单层塔^⑤

图 5 唐至五代的单层覆钵塔

① 扬之水《曾有西风半点香——敦煌艺术名物丛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第 21 页。

② 图片引自王中旭《河南安阳灵泉寺灰身塔研究》，中央美术学院 2003 年硕士论文，图 26。

③ 图片引自王中旭《河南安阳灵泉寺灰身塔研究》，图 49。

④ 图片来源：数字敦煌，网址：<https://www.e-dunhuang.com/>。

⑤ 图片引自孙儒侗《敦煌壁画中塔的形象》，《敦煌研究》1996 年第 2 期，第 11 页。

杨超杰、严辉曾在《龙门雕刻精萃·佛塔》一书中说：“塔身塔檐是组成塔的整体形制中的敏感构件，它们的时代感类型感比较强。其他构件如塔刹、塔基的形制，在区别塔的形制特征中所起到的作用很小。”^①可见塔身和塔檐是关键部位。前述唐五代的单层方形覆钵塔，不管如何花样出新，其塔檐的双层或多层带收分的阶梯形式却未变过。但五代吴越王金涂塔的塔檐则变为倒梯形的斜面，这种变化一定是在观念上或有外界事物介入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它亦当有变化的痕迹可寻，而不是突然出现。

二、唐代重檐佛帐与金涂塔



图6 小铜塔^②

吴越王钱俶并非是造金涂塔这种形制佛塔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已有相同形制的小塔出现。如藏于日本的天祐二年（905）的小铜塔（图6），此塔与吴越王塔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基座束腰部分是壶门而不是禅定佛，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明清时期的仿制品。^③但另一个证据则比较可靠，这是1987年黄岩灵石寺塔天宫出的一件铜塔座，从该塔座的样式以及四面的禅定佛图像上不难看出此塔与吴越王金涂塔形制相同，从塔底铭文“陈八娘为亡妣林十娘子女弟子造塔一所永充供养乾祐三年（950）二月十八日记”^④可知此塔比吴越王第一次造金涂塔还早五年。这一现象说明，在吴越王金涂塔之前，这种形制的塔已经出现，它应当有一个演变的轨迹，即先期的发展形式。笔者在考察这一演变的过程中发现唐代的佛帐对金涂塔形制的出现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莫高窟盛唐第103窟壁画中有一座小塔，此塔亦为单层方形覆钵塔，基本形制与北朝晚期以来的单层方形覆钵塔无大差别，受花为扇面形，是唐代众多受花形式之一，唯塔檐这一敏感部位有别，是呈倒梯形的斜面塔檐（图7）。此种塔檐唐前未见，在此为叙述方便不妨称之为新式塔檐。^⑤此塔在原来单层方形覆钵塔的基础上首先变化了最为敏感的塔檐部位，但覆钵还保持原有的特征。它或许是吴越王金涂塔形制的一种早期形式。除此塔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这就是上海青龙镇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小塔。上海博物馆在2010至2016年对青龙镇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在隆平寺佛塔地宫同时出土了两件形制十分相似的小塔，一个为铅贴金小塔，形制与吴越王塔完全相同。另一个为小铜

① 杨超杰、严辉《龙门石窟雕刻粹编·佛塔》，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② 图片引自金申《中国历代纪念佛像图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图版294。

③ 金申先生认为此塔是明清时代的仿品，在此聊备一说，参见金申《吴越国王造阿育王塔》，《东南文化》2002年第4期，第48页。

④ 黎毓馨《阿育王塔实物的发现与初步整理》，《东方博物》2009年第2期，第41页。

⑤ 因壁画中表现的是一座砖塔，所以塔檐密排叠涩，但实际上表现的是一个倾斜的平面，例如嵩山大法王寺的实体大型砖塔，就可见到此种形式，这与明显阶梯状的塔檐有本质区别。

塔(图8),主体形制与吴越王塔相同,如饰有“荣耀之面”呈倒梯形斜面的新式塔檐,方形塔身四面雕本生故事,基座中部饰有一圈禅定佛。其与吴越王金涂塔最明显的区别主要有三:一是塔下加有一个宽大的带壶门的底座;二是在塔身与基座之间加有一圈栏杆;三是塔檐四角各探出一个龙头,四角的受花还是北朝晚期以来就有的呈犀角状的受花,如前文所举东魏北齐背光式造像上的小塔受花,只是弯曲弧度更大。这座小铜塔的重要之处在于,它的主体既与吴越王金涂塔相同,但同时又比金涂塔多了一些部件,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去掉这些部件便与金涂塔完全相同,这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而且,它和另一件与吴越王金涂塔形制完全相同的贴金铅塔同时出土,说明这两种既相似又有差异的小塔形制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关联。上海青龙镇隆平寺塔建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①地宫中此二塔无时间题记,可能为宋制,但也不排除将早期塔埋入地宫的情况。其中贴金小铅塔不论是五代的遗留还是入宋后新制,它的形制来源很清楚,但带有栏杆的小铜塔其栏杆是对前代的模仿,还是入宋以后才加上的呢?这还需从小塔本身所提供的信息进行考察。新式塔檐四角探出龙头,塔身四周还出现栏杆,再结合方形塔身,这些特征最易让人联想到的就是唐代的佛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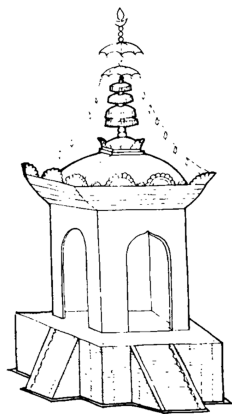


图7 第103窟盛唐单层砖石塔^②

图8 青龙镇地宫出土小铜塔 北宋(作者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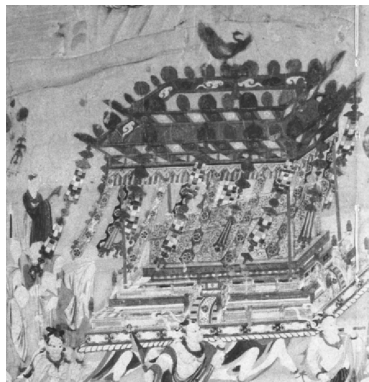
帐也称帷帐,本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室内家具器物,以骨架支撑、纺织品围之,既有屏蔽风沙的实际功用,也体现尊卑有别的空间秩序。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不断汉化,帐的形态开始大量应用到佛教的龕像之中,成为重要龕形之一。南北朝时期的佛帐是方形或长方形帐身,帐檐下有三角形垂额、羽纹装饰,两侧挂有璎珞流苏之类,以盃顶为常见。帐檐部位就是一根横梁,檐口上装饰着博山、火焰宝珠或花苞等饰物。^③此种帐的形象不论是石窟、造像碑,还是世俗图像中均可见到。但进入唐代,这种佛帐发生了变化,垂额等装饰依旧,但帐檐则变为一个呈倒梯形的斜面,顶为盃顶,然盃顶上又多

^① 王建文、陈杰《上海青龙镇遗址》,《大众考古》2017年第7期。

^② 图片引自孙儒侗《敦煌壁画中塔的形象》,第11页。

^③ 扬之水《曾有西风半点香——敦煌艺术名物丛考》,第8-15页。

了一重与第一层完全相同的帐檐，构成重檐。这种帐在莫高窟盛唐时期 148 窟《涅槃变》中有着生动体现（图 9-1）。而现实中则见于法门寺地宫的石灵帐（图 9-2）以及临潼庆山寺的释迦如来舍利宝帐（图 9-3）。只是石雕佛帐的帐檐上没有壁画中那么丰富的装饰，石佛帐四周也省去了栏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呈倒梯形斜面的帐檐，则很可能是受到来自粟特建筑的影响。北周史君墓石椁上所雕刻的粟特建筑，屋檐就是这种呈倒梯形的斜面（图 9-4）。此外，就在庆山寺的舍利宝帐的帐身左侧，以阴线刻手法刻有一幅《八王分舍利图》，图中的建筑就是粟特式的（图 10），与史君墓石椁上的粟特建筑，不论是建筑形式还是穹顶上的装饰纹样均如出一辙。粟特建筑直接出现在佛帐上，进一步表明新式佛帐与粟特建筑的关联。佛教来自西域，八王分舍利的场景设置在西域建筑中进行，反映出唐人对佛陀西域身份的认同，那么佛帐发生这种变化也便不难理解了。至于双重帐檐，这则与具有双覆钵顶的单层方形覆钵塔有着相同的构思，自南北朝以来的双重华盖、经幢均可成为其意象来源。

9-1 佛灵帐^①9-2 石灵帐^②

9-3 庆山寺释迦宝帐（王楠拍摄）

9-4 北周史君墓石椁上的粟特建筑^③

图 9 唐代佛帐与粟特建筑

① 图片引自段文杰主编《中国壁画全集·盛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图190。

② 图片引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编著《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③ 图片引自杨军凯、孙福喜《西安市北周史君石椁墓》，《考古》2004年第7期，第42页。

重檐佛帐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它影响到石窟中的龕形，一如北魏的汉化改革使帐形龕在北朝一度盛行一般。敦煌莫高窟盛唐第74窟，西壁佛龕即是重檐佛帐龕（图11）。扬之水老师在《曾有西风半点香》一书论及“宝交饰”一节时，曾提及此龕。此佛龕本身是在墙壁上开的一个方龕，帐是画上去的。在龕的上部边沿，有一排圭形山花蕉叶，其下部黑色边框的二方连续图案即是第一层帐檐，它下面的三角形垂额，以及龕的两角垂下的璎珞珠串也说明了这一点。龕沿上部蓝色扁梯形部分是盥顶，再上面的二方连续图案是第二层帐檐。此佛龕双重帐檐上的二方连续图案形式与法门寺、庆山寺以及壁画上佛帐帐檐的图案形式一样，只具体图案内容各有所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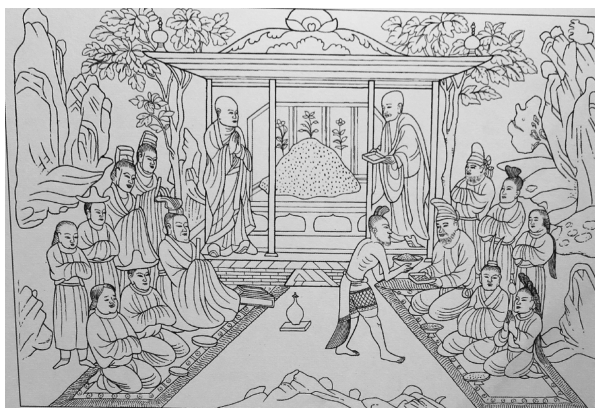


图10 如来宝帐八王分舍利线描图（王楠拍摄）



图11 莫高窟第74窟西壁重檐佛帐龕 盛唐^①

不仅在北方，南方也存在大量重檐帐形龕。巴中石窟群是比较集中的一处，如巴中西龕龙日寺摩崖造像（图12），以及南龕摩崖造像（图13）。这些摩崖造像，密密麻麻布满崖面，其中大多数是重檐帐形龕。川地出现大量重檐帐形龕与“安史之乱”明皇幸蜀的历史背景相关。

^① 图片引自扬之水《曾有西风半点香——敦煌艺术名物丛考》，第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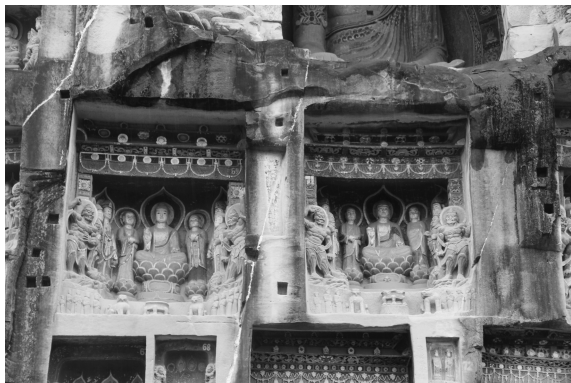


图 12 龙日寺重檐帐形龕（作者拍摄） 图 13 巴中南龕摩崖重檐帐形龕（作者拍摄）

再看青龙镇小铜塔与重檐佛帐的关系。如果将重檐佛帐的第二重檐忽略不计的话，青龙镇小铜塔的塔身与重檐佛帐的帐身形制相同（图 14）。特别是小塔四周的栏杆，莫高窟 148 窟《涅槃变》中佛帐四周也同样有一圈栏杆，而且四面还有桥状的踏步，青龙镇小塔的栏杆四面恰恰也留有四个缺口，显然这是从踏步通向塔身的入口。可见青龙镇小塔出现这种带栏杆的形式也应是在模仿现实中的佛帐。小塔这圈栏杆的栏板样式与庆山寺地宫出土金棺上的栏杆、法门寺地宫出土殿宇式铜塔上的栏杆一样，栏板是一种横竖相错的形式，这种形式直至晚唐仍在，而根据李诫《营造法式》，宋式栏杆则是“𠂔”字相连的样式。青龙镇青铜小塔若非前代所留，便是对前代佛塔的高仿。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青龙镇小塔塔檐上的“荣耀之面”图像，这个口衔卷草的兽面早在初唐的单层方形覆钵塔上已经出现，如前面所提垂拱三年（687）静行比丘尼灰身塔，其位置紧挨在塔檐下。安阳灵泉寺有这种兽面纹的单层方形覆钵塔还有多座，但不是每个兽面均含卷草，其图像组合呈多样性。而更重要的是，在巴中重檐帐形龕的第一层帐檐上也有同样的衔卷草兽面图案，如龙日寺帐形龕（图 15）和南龕帐形龕（图 16），而且从形象特征上来看，巴中西龕龙日寺的兽面图像与青龙镇小铜塔以及吴越王金涂塔上的兽面纹（图 17）更加接近。这也是佛帐的帐檐形式直接影响到单层方形覆钵塔塔檐的一个有力证据。



图 14 青龙镇小塔（作者拍摄） 图 15 巴中西龕龙日寺帐形龕帐檐上的兽面（作者拍摄）

至于青龙镇小塔或金涂塔四面出现佛教故事，这在唐代也早已有之，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大云寺，东浮图北有塔，俗呼为七宝塔，隋文帝造。冯提伽画车马并帐幕、人物，已剥落。又东壁、北壁，郑法轮画。西壁田僧亮画。外边四面杨契丹画本行经。”^①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庆山寺石佛帐的四面也刻有佛教故事，只不过内容为涅槃类图像。



图 16 巴中南龕帐檐兽面（作者拍摄）



图 17 金涂塔塔檐上的兽面（作者拍摄）

还有一个小细节也颇能佐证粟特建筑、佛帐以及有着新式塔檐的单层覆钵塔的关系。粟特建筑与庆山寺石佛帐以及上海青龙镇出土小铜塔，三者的檐角上均有一个兽头。史君墓粟特建筑檐角上是一个翻鼻兽，颇似摩羯鱼（图 18），庆山寺帐檐檐角是一只金翅鸟（图 19），青龙镇出土小铜塔的檐角是一个龙头（图 20），虽然具体动物形象不同，但出现位置一样，且都是神兽。细节高度的一致性也说明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即新式塔檐单层覆钵塔出现的渊源。此外，青龙镇小塔下宽大的壶门底座，它的形式结构特点与庆山寺舍利宝帐下的底座一样，壶门不是位于底座中间而是偏上的部位，壶门上部的叠涩小而紧密，下面则是宽大而舒缓。可见此塔底座亦近唐式，与栏杆、塔檐兽

^① [唐]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年，第 64 页。

面、檐角龙头一样均是来自于唐。



图 18 史君墓粟特建筑檐角兽头 (作者拍摄)

青龙镇小塔或吴越王金涂塔,除了在形式上与唐代重檐佛帐的关联外,更重要的还有一层意义的关联。青龙镇小塔或吴越王金涂塔虽称为塔,但也是舍利容器(塔型舍利容器),金涂塔里面放的是《宝篋印经》,虽非佛骨舍利之类,但此为法舍利,^①与佛骨舍利等无差别。上文所涉唐代重檐佛帐,除石窟或摩崖佛龕之外,均与佛舍利的瘞埋放置有关,也可以说是比金棺银椁之属更大一些的舍利容器,法门寺和庆山寺地宫石佛帐莫不如此。出现在莫高 148 窟《涅槃变》中的佛帐,其情景是出殡的场景,佛帐中放置棺椁,这与庆山寺石佛帐内放置金棺银椁一样,可见这是唐代舍利瘞埋的一种制度,已与前代不同,佛帐的使用是这一制度变化的一部分。^②青龙镇小塔或金涂塔的形制模仿佛帐,很可能便是唐代舍利瘞埋制度影响的结果。



图 19 释迦宝帐檐角上的金翅鸟 (王楠拍摄)



图 20 青龙镇小塔檐角龙头装饰 (作者拍摄)

① 此点由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学弟吴天跃博士提出。

② 参阅杨鸿《法门寺塔基发掘与中国古代舍利瘞埋制度》,《文物》1988年第10期,第31页。

三、总结

从现有重檐佛帐的资料来看,时间最早是法门寺地宫里唐景龙二年(708)的石佛帐,其他石佛帐、壁画中的重檐佛帐、石窟重檐帐形龕均集中于盛唐及盛唐之后。由此不难看出,重檐佛帐早在初唐便已出现,盛唐时颇为流行,影响到石窟佛龕的样式以及单层方形覆钵塔。前文所提之莫高窟盛唐第103窟有着新式塔檐的单层方形覆钵塔,便是出现在这种背景之下,因此它应是吴越王金涂塔的初期演变形式。青龙镇小铜塔的诸多要素均指向唐代,说明此塔形制很可能先于金涂塔形制存在,它尚处在极力模仿重檐佛帐形态的阶段。其实就历史背景而言,上海青龙镇是一个“形成于唐,鼎盛却在宋”的地方,^①这里也发掘出很多唐代遗物,^②若此小塔真为宋前之遗物,后埋入宋塔地宫,也顺理成章。而且,青龙镇小塔的受花虽与金涂塔有别,但也是只与乙丑岁(965)即第二次所造之金涂塔差别较大。吴越王前后两次造塔,第一次所造之塔受花似犀角状,但比较直,受花外向面是天王力士像,内向面为坐佛。此受花外形与青龙镇小塔近似。而第二次造塔受花则变为一个三棱柱体,图像更为复杂,分上下两层表现佛传故事。塔身的本生故事再加上受花的佛传,如此方能完整体现释迦牟尼佛的前世今生。设计意图的增加导致受花的改变,吴越王前后两次造塔,本身就显示出受花从简至繁的变化过程。^③因此,亦可知青龙镇小塔形式应先于金涂塔。当然先出之塔形,后世也依然会流传,与后来演变之塔形并存。至于覆钵的缩小,推测可能与新式塔檐有关,这种呈倒梯形的塔檐本就带有西域因素,而覆钵这个同是来自域外的因素可能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况且金涂塔这种形制本就是受重檐佛帐的影响,重檐佛帐尽管有重檐,但它的顶基本是平的(盃顶),故而单层方形覆钵塔的覆钵变得非常小且低平,最后也就只剩一朵平面浮雕的莲花。

简言之,唐代中国原有的帐在受到外来建筑形式的影响后,出现了帐檐呈倒梯形的重檐佛帐,这种新式的佛帐既影响到当时的佛龕样式,同时也影响到单层方形覆钵塔,尤其是塔檐部位的变化,最终形成了吴越王金涂塔的样式,而青龙镇小铜塔形制与唐代的重檐佛帐最为接近,是金涂塔这一变化过程的过渡形式。金涂塔形制的出现与唐代重檐佛帐密切相关,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可能源自唐代舍利瘞埋制度的变化。

① 青龙镇考古队《2010-2012年青龙镇考古的主要收获》,《上海文博论丛》2013年第1期,第38页。

② “就目前资料来看,靠近窑河的通波塘西岸以唐代文化层为主,宋代遗存较少,而在通波塘东岸则唐、宋代遗存都比较丰富。”参见何继英、王建文、高文虹、郭荣成、薛浩斌、陆铖《上海市青浦区青龙镇遗址2012年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4年第4期,第59页。

③ 本文这里并不是说双层图案的受花是吴越王第二次造塔时才出现,只是说它反映了一个从简到繁的过程。其实杭州市萧山区博物馆藏所藏的一件萧山祇园寺东石塔出土的金涂塔,造于显德五年(958),比吴越王首次造塔仅晚三年,其受花已是双层。此塔非吴越王所造。